

运用口述史方法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 王炳林 石卓群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运用口述历史方法进行历史研究自古有之,近年来逐渐成为历史学界较为热门的研究方法之一,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亦是如此。口述历史方法在深化党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拓展党史研究的视野,揭示党史研究中“上下互动”的合力结果,提高党史研究的科学性。但由于口述历史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研究者的不规范应用,口述历史方法在党史研究应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題,需要党史研究者树立正确的党史观,选择恰当的书写方式,运用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深化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关键词】口述历史 中共党史 研究方法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4.001

研究方法是指在科学研究中通过一定的工具和手段,揭示事物内在客观规律的行为方式和规范。没有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就不能形成准确严谨的研究成果。毛泽东曾深刻而又形象地分析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者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中共党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要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坚持分类指导,明确学习要求、学习任务,推进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2]。口述历史方法是历史学界近年较为热门的研究方法,在党史学术研究与学习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梳理口述历史方法的来龙去脉,研究其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对于党史学习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口述历史方法概述

虽然口述历史方法20世纪在学界才得以确立,但运用口述方法从事历史研究自古有之。19世纪中叶后,随着历史学专业化不断发展,兰克学派兴起,认为档案文献史料是唯一可靠的

收稿日期:2021-05-10

作者简介:王炳林,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党的建设;

石卓群,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编号:13&ZD0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史料,“科学历史学派”认为口述历史是民间传说和神话,口述历史方法受到学术界冷落。20世纪初,随着兰克学派受到挑战、新史学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重新认识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内文斯创建口述史研究中心,开始用口述历史方法记录美国重要人物的回忆,第一次使用“口述史”这一概念,这一研究也作为学术界研究历史的新方法而正式确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术领域的建立。

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口述史学在美国迅速发展,逐渐走向专业化,“口述历史”这一术语也已深入日常语言之中,随着其在世界各国历史学中的不断发展,第一届国际口述历史大会和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相继召开和成立,世界各国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被广泛探讨研究,并成功超越学科界限,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概念开始从西方传入中国,在中国开始有所发展。在口述历史理论著作方面,自90年代开始,部分历史学家开始翻译西方的口述历史理论著作,如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杨立文、钟少华、杨雁斌等历史学者撰写学术论文对口述历史方法、口述史学进行介绍。进入21世纪,口述历史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著作。一系列口述历史图书出版物,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陆续出版;大众传媒领域的口述实践也不断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口述历史成果的展现方式逐渐多样化。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学校等单位纷纷组织展开口述历史调查,研究主体朝着大众化方向发展。

对于口述历史这一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就是通过记录访谈来收集记忆和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3]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4]杨立文则认为:“口述史学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指搜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5]。可以看出,虽然不同学者对口述历史有不同的定义描述,但从中可以看出,对“口述历史”这一概念,可以分为“口述”和“历史”两个方面。“口述”强调史料的来源,与传统的单一文献、档案史料不同,口述史料是个人或群体通过语言叙述,回忆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而形成的文字、语音、视频资料。“历史”强调史学的基本规范,对于口述者的回忆讲话要完整保留下来,以备核验,同时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分析和整理才能成为符合史学规范的史料。

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从研究方法角度而言,口述历史方法是指研究者基于某一特定历史主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通过采访当事人,将其访谈记录进行分析、整理、加工,形成规范史料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口述历史方法主要包括五个基本要素:研究主题、当事人、访谈内容、研究形式、研究技术。研究主题是口述历史方法的中心,可以分为单一主题与群体主题两大类。单一主题一般为对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群体主题主要是对特定事件中的群体人物或群体记忆中的某一人物进行研究。当事人是口述历史方法中的主体,既包括历史事件中的中心人物,即对历史事件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导人;也包括历史事件中的参与者,即在历史事件中处于非决定性作用的执行者;还包括虽未直接参与,但亲见亲闻历史事件的知情人。历史是口述历史方法的核心,强调当事人访谈记录的内容必须是历史,而不是凭空杜撰的故事。研究形式是口述历史方法成果的展现方式,主要包括口述史料丛书、个人回忆录或访谈录、研究性回忆著作等。研究技术是指研究过程中运用录音、录像等方式,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访谈过程进行音频、视频、文字采

集,并将其保存留档,以备查验。

需特别注意的是,对于回忆录、访谈录与口述史料的关系,学界目前还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回忆录和口述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杨立文认为:“目前我国出版的许多回忆录,应看作是口述史学的成果,其中多数都是在调查采访并核实文字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又不能把回忆录与科学的口述史学划上等号,因为有些回忆录经过文学家之手,作了过多的润色加工、渲染夸大,有失历史真实性的原则。总之,这二者有联系,又有区别”^[6]。部分学者则认为回忆录、访谈录与口述史有着严格的区分。梁景和、王胜认为:“口述史与访谈录不同。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阐述,并且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些任务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所以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采访后形成的访谈录则是单纯的采访记录,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7]。笔者认为,作为研究方法的口述历史,应将回忆录作为口述历史方法的资料来源和成果形式之一,对各种回忆录进行筛选区分,对符合历史事实、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应将其纳为口述史料范围,而不能一概抛弃;对于研究性质的、经官方审定出版的回忆录,更应该作为口述历史的重要成果形式加以充分利用。

与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不同,口述历史方法在史料搜集、整理、运用过程中具有其独特特征。首先,口述历史方法具有双向互动性。传统的档案文献资料虽然能够佐证研究者的观点和假设,但在使用过程中,文献资料本身并不会主动告诉研究者观点和结论,完全靠研究者发掘。口述历史方法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和受访者是平等的,访谈者根据受访者的回答不断修改完善访谈提纲,受访者也根据访谈者提供的相关史料来补充、改变自己的记忆认知,二者在多次对话交流中不断加深对特定历史的认识和把握。

其次,口述历史方法具有动态性。口述史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口述回忆与历史事件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受访者受到个人经历、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对特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回忆由“过去的声音”变成“现在的声音”,具有一定的“后见之明”。这也是部分历史学者对此方法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历史史料应如同档案文献一般,不可改动,否则便不能展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口述历史方法与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不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史料本身具有价值判断的属性,在对口述史料的收集、加工、整理过程中,有心的历史学家会从这些“后见之明”中分析把握受访者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正所谓“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将过去、现在、未来统一于历史中。口述历史方法的动态性,正是对历史事件价值判断的修正与完善。

再次,口述历史方法具有人民性。以往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虽坚持群众史观,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普通群众由于缺乏专业的历史学科基本素养,难以参与其中,而在口述历史方法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口述访谈中的受访者,历史不再仅仅是王侯将相、杰出人物的历史。这不仅能够真正使群众史观在研究方法层面得到充分展现,也使广大普通群众有了诉说个人经历的机会。这些过去沉默的大多数,虽不能完整准确介绍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但却能从日常生活的叙述中,以个人参与或旁观视角回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类似于田野调查,帮助历史学家还原真实丰富的历史环境。

最后,口述历史方法还具有跨学科性。现代口述历史方法自提出以来,不仅在历史学学科被逐渐广泛应用,还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在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发展进步。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医学等领域,口述历史方法已经成为其收集和保存其学科历史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口述历史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发展及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十分注重党史资料的收集和保存。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便有意向全体红军指战员征集长征故事。由于在红军战士中,会识字写字的不多,所以很多故事都是由亲历者口述,他人代写而成,这是党史上的一次大范围征集史料行动,《红军长征记》便是在众多口述资料中经过红军总政治部编辑整理后形成的史料。1936年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中央苏区,在采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广大红军战士的同时,结合《红军长征记》文本内容,撰写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将口述史料与文本内容相结合形成历史文学著作,成为后来国内外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一时期口述历史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处于萌芽阶段,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募捐宣传,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总结历史这一优良传统,口述历史方法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们了解红军长征积累了宝贵的史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界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调研实践,为党史研究增添了许多鲜活的史料。改革开放前,高级军事将领和党政要人的回忆录《星火燎原》《红旗飘飘》和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成为当时重要的口述党史资料。全国政协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口述历史收集整理工作,各地也纷纷成立地方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集各类资料,称之为“实地调查”,征集了大量近现代史、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实地调查”变成了片面为政治服务,成为“影射史学”,口述历史研究陷入停滞。这一时期,口述历史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以政府和研究机构,特别是以高等学校为主,通过大量采访调查,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红军长征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收集口述史料,抢救了许多“活历史”。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科学的口述历史方法理论,虽然进行了较多调查采访,但专业的口述史研究人员和组织机构较少,依然存在调查研究不规范等问题,这在研究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一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反,还为改革开放后口述历史方法逐步迈入正轨奠定了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口述历史方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口述史学”这一概念表述开始被学者们使用。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通过口述的方式回忆自己一生的革命工作经历或某个时期的具体历史事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和《峰与谷》、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胡乔木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这些著作的主要特点是研究性强,通过作者口述史实,他人整理并对照档案文献写成文稿,再由口述者审阅修改,征求专业部门意见后,交由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21世纪,《百年潮》杂志、《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等开设专门版面刊登口述党史资料。解放军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了《星火燎原》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11年推出了157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这一时期,口述历史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口述历史方法逐渐被科学运用,口述历史理论著作的翻译、撰写,党史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运用口述历史方法,结合档案文献充实丰富党史内容;以研究性为目的,经官方审定的回忆录大量出版,各类期刊、杂志开设专栏通过刊登口述文章的方式广泛收集口述党史史料,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口述史料加以整理、完善、再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原党史研究室在征集、整理、出版口述党史史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继出版《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改革开放口述史》《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口述抗战》等系列口述史料丛书,丰富了口述史料种类,深化了对党史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认识。

随着口述历史方法逐渐科学化、规范化,其在深化党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恩格斯为支持贝克尔撰写回忆录多次专门致信伯恩施坦等人,认为回忆录“对我们党成立前的历史(1827-1860年的革命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五十年代到现在)来说会是一部新的文献资料”,“没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能够忽视这部文献的”,而且也将是“出色的和生动的真正人民读物”。“如果贝克尔不做这件事,这些岁月所发生的事件就将永远被人遗忘,或者是由敌视我们的人民党的人或其他的庸俗民主派来描述这些事件,而这是不会为我们服务的。现在有一个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好机会,我认为错过这个机会就是一种犯罪行为”^[8]。正如恩格斯所言,口述史料对弥补文献史料不足、拓宽党史研究视野、增强党史知识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口述历史方法能够充实党史研究的史料,形成严格的学术规范。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生存条件残酷,在战争转移和秘密工作中,大量的文献资料没有被保留下来。部分历史事件由于其机密性和复杂性,没有形成文字记录,党史研究者在研究这些历史事件时出现文献史料“真空”。运用口述历史方法使用口述史料则是弥补文献史料缺乏的重要方式之一。不仅如此,单纯的文献史料仅仅从文字层面对历史事件进行书写记载,但历史事件的形成过程、重大决策制定时的台前幕后,是不能单纯依赖文献史料充分展现的。运用口述历史方法研究党史,充分发掘当事人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回忆与切身感受,通过与同一口述对象的多次对话,或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口述对象开展对话,反复验证同一历史事件,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再与文献史料互证,不仅能够更加完整清晰地展示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而且有助于党史研究形成严格的学术规范,做到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相统一。

其次,口述历史方法能够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为党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运用口述历史方法研究党史可以突破传统文献史料的限制,在与口述对象对话时,把握特定历史背景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特定人群对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接受程度,以新的视角和观点开展党史研究工作。如阿沛·阿旺晋美回顾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的经过,以西藏噶厦政府代表的视角描述谈判细节,通过对噶厦政府代表团成员对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心理态度转变的细致刻画,以及在对待班禅时的谈判险些陷入僵局的紧张感描写,从西藏地方政府视角展现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时的复杂与艰辛,更突显了西藏和平解放对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重大历史意义^[9]。

再次,运用口述历史方法研究党史能够强化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揭示党史中“上下互动”的合力结果。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共党史的创造者,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决策、每一场关键性的战役、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是靠广大人民群众具体实施和完成的。研究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光辉历史,不仅要看到领袖人物、杰出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作用,而且要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基层指战员的基础作用。运用口述历史方法研究党史,能从受访对象的回忆描述中生动再现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亲身经历,通过对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对同一实践回忆的对比,揭示党史中“上下互动”的合力结果。

最后,口述历史方法能够充分发挥口述史研究者与口述者互动性强的优点,使党史书写更加生动鲜活。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口述历史方法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口述史料的采集过程是采访者与口述者不断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采访者通过主动提问的方式,引导口述者按照采访者的研究范围进行口述,口述者根据自身的所见所闻,对特定的历史事件进行回忆。万毅在《风云突变的庐山会议》口述史料中,对庐山会议7月23日散会后毛泽东、彭德怀、林彪三人的神态、动作、语言回忆得绘声绘色:“散会以后,我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彭总立刻迎上去,贴近毛主席,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

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主席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我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而林彪这时恰好站在我身旁,他手里拉着一棵小树的树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是什么态度。”^[10]短短一段话,就把读者带回几十年前的会议现场,直观感受关键人物的行为和心理状态,这不正体现了口述历史方法的生动性吗。口述历史方法可以将生动鲜活的史料展现给群众,使群众对过去发生的党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更为直观的认识。

三、口述历史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1]党史研究作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一时代的新内容与新方法,口述历史方法就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应用于党史研究渐成气候的。但由于口述历史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在党史研究中同时也存在访谈不深入、资料互证不足、方法使用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党史研究者特别注意并努力克服。

首先,口述历史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影响党史史料的客观性。中国共产党已有 100 的历史,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事件,亲历者很多已经去世,其后代也已进入耄耋之年,很多当事者丰富的口述回忆随着当事人的去世而没有保留下来,这是党史研究工作中的一大损失。同时,由于口述历史方法依靠口述者本人回忆,在多年之后接受采访时,对于回忆的历史事件往往因为记忆模糊与历史事实存在偏差,口述者口述内容的主观性与历史本身的客观性之间存在矛盾。如叶永烈在对李达夫人王会悟访谈中共一大回忆时,王会悟回忆“翻译杨明斋坐在门口附近望风”,但经过调查发现此时杨明斋正在苏联,因为事隔 70 年造成记忆模糊,导致口述失误^[12]。

其次,口述者个体受环境、地位甚至立场观点差异的影响,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存在不同的认识。如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采访时,面对西安事变,“经常会询问采访者,东北军将领怎么说,大陆的书籍怎么记载,台湾学者持什么观点,有时十几分钟不发一言,静静地听采访者给他读书。他在静听的同时不排除他在搜寻和校正自己的记忆”^[13]。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很难有正确的历史研究。历史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对历史的研究却是主观的。人们看到的历史,都是由研究者提供的,而研究者都是有主观倾向的,研究者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地位、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依据的史料和认知水平等差异,都会影响其对历史的叙述和解释。对待同一历史事件,历史观不同、站在不同立场上进行研究,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最后,口述采访依然以上层精英人物为主,群众史观贯彻不到位。目前党史研究中对群众态度和作用的描述仍存在抽象、概念化的倾向。在口述历史方法运用过程中,群众的作用如何表述,仍是党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胡乔木认为,党的历史是群众的历史,也是共产党员群众的历史,不仅仅是党中央某几个人的历史。党中央领导的正确就是能够使得这些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发挥出来,而且能够有效地在历史上起作用。研究党史不能从会议、文件出发,而要从历史实际出发,要从文山会海中走出来。在口述史料的征集、整理和运用时,研究者往往会选择在历史事件中发挥作用的有一定职务的亲历者,而忽视征集人民群众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回忆与感受。这种做法,长此以往,会将人民群众这一历史视角散失,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成为被人们遗弃的过去,造成党史研究“线性历史”的封闭叙事,这既是对广大沉默的人民群众的不公正,也是对党史上“不同声音”的否定与忽视。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方法传入中国时间不长,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于部分概念及研究方式还存在争论,无论是学科意义上的口述史学,还是史料意义上的口述史料,以及研究方法层面上的口述历史方法,都还处于发展时期。受到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部分研究者依然不自觉地采用自上而下书写、诠释历史的方式进行口述党史研究,在旧有观念的影响下,下层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和历史的复杂性都被忽视了,微观个体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丰富人生阅历和经验感受被一笔带过为“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持”。党史研究不是抽象的学院派理论,在口述历史中,依然存在从概念到概念、从事件到事件、从结论到结论的书写方式,过于抽象晦涩,产生“蜡像化”的研究成果,这恰恰违背了口述历史的初衷。

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口述历史方法本身具有的主观性动态性与中共党史本身的客观性规范性存在矛盾,使得部分学者在党史研究过程中对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不能很好把握,甚至出现政治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目前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错误倾向:“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等等。”^[14]口述党史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缺乏正确的立场和原则。归根到底,是因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感不足,缺乏“史德”,没有树立正确的党史观。运用口述历史方法进行研究,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产生研究成果的,不仅要做扎实的准备,还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果不能摒弃浮躁与功利性,就无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将收集到的口述史料进行加工整理,多方考证、打磨,从而形成科学规范的口述历史。

从研究规范与学科性质来看,中共党史研究人才队伍虽不断壮大,但从口述历史这一角度入手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数量上还不足,在研究规范性上与专业的口述历史学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虽然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近年来致力于口述史料的编写整理,但在整个党史学界还没有专门的口述历史组织,缺乏统一的口述历史方法规范。由于中共党史在现行学科门类划分上仍处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联系密切,这些学科研究方法众多,口述历史方法在这众多方法中并没有突显出来,在党史研究与教学过程中往往不受重视,这也造成了方法运用不规范、口述研究者学养不足的问题。具体说来,由于研究者学养不足,在口述历史访谈、收集、整理过程中难以深入挖掘史料,“问题意识”不足。对于口述历史、口述史料、口述史学等基本概念还没有区分清楚,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将口述史料与研究成果划等号。由于口述史与访谈录、回忆录的关系较为复杂,口述研究者如果不能仔细区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入材料使用不得当的误区,难以准确勘误、深入调查和正确理解口述史料。这些都是口述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15]。

四、科学运用口述历史方法深化党史研究

论从史出是史学的基本原则,对历史的认知和阐释,都应该是从资料证据中总结出来。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光辉历史留存了浩如烟海的口述史料,如何搜集和整理、如何考证和运用这些史料,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运用科学的方法,为党史研究与学习教育服务。

首先,要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树立正确的党史观,这是口述党史研究的核心。面对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党史研究者应自

党担当起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大任。第一,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整理、编纂工作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通过口述历史方法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等提炼出来,让广大干部群众切身感受我们党的艰辛历程、巨大变化、辉煌成就。第二,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处理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运用口述历史方法从事党史研究,难免会遇到对党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回忆与评价与官方不一致的地方,甚至会有较大出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坚持以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谨慎对待口述史料中有出入的表述,实事求是地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第三,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进行口述党史研究时要坚持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方法,面对市场化、商业化大潮下部分口述出版物歪曲史实、恶意炒作的不良倾向,要主动出击、敢于亮剑,运用口述历史方法生动还原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做到有理有据,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

其次,要加强专业口述党史机构建设,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口述党史工作者。口述历史方法已经经历了“中国化”进程,将西方史学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学研究传统相结合,转变为符合中国历史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党史研究者则需要进一步将其内化,形成适应党史学科发展要求的理论研究方法,而这需要专业机构的建设和专业人才和培养。在具体落实中,要整合各级党史和文献研究所、高等学校、各级党校和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机构的专业人员,打造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口述党史团队,形成统一的口述党史操作规范,培养专门的口述历史理论学者和调研人员,形成收集、整理、保存、出版于一体的系统模式。在党史研究与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口述历史方法研究的作用,编写适合党史研究的口述历史方法教科书,开设口述历史方法相关课程,在党史人才培养中发挥主动性。对口述党史研究者的培养既要注重“史才”,把握好口述历史方法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征,以及在党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培养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更要注重对“史德”的培养,要引导研究者在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基础上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拒绝投机取巧、远离自作聪明,打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口述党史成果。

再次,要规范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运用。面对许多重大事件亲历者年事已高、记忆衰退或已离开人世的现状,口述党史研究者要以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搜集整理口述史料,及时抢救“活历史”,这是党史口述研究者当下面临的紧要工作。对于回忆录、访谈录等史料,应进行严格把关,对符合口述史料的部分妥善使用,对不符合口述史规范的史料则不可随意使用。要坚持史料互证,坚持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档案史料的互证,如果发现不同类型史料对同一历史事实的记录存在矛盾,要坚持口述史料服从文字史料的原则,通过其他史料进行佐证对比,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党史研究中,口述史料的使用并不是越多越好,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往往有较多口述史料,但在党史研究中万不可采用“拿来主义”,如果不加以对比选择仅仅将这些口述史料堆积使用以说明观点,不但不能体现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反而会使得党史研究庸俗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16]。

最后,要多样化生动地展示口述党史成果。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运用口述历史方法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宣传党的历史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方式。这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口述历史的作用,打捞历史缝隙中的不同声音,使得党史更加生动鲜活;而且能够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在口述者生动的叙事中将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传递给人民群众。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口述党史展示成果逐渐多样化,要抓住机会制作发行一系列生动鲜活的口述党史影视作品和出版物,进行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口述党史研究者要改变过去的书写方式,避免口述成果“蜡像化”,将中国共产党100年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宏大叙事通过生动鲜活的方式呈现给人民群众,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口述党史不能仅仅停留在讲故事、听故事层面,要通过口述的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加深对党的历史和理论的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资政育人”,这是口述党史研究的最终目的。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17]运用口述历史方法深化党史研究,将我们党100年光辉历史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是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的重要方式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8]。运用口述历史方法研究党的历史与理论,学习好党史这门必修课,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汲取智慧和力量。

参 考 文 献

-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 [2][14]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1年第7期。
- [3]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3版),邱震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 [4]钟少华:《进取集——钟少华文存》,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 [5][6]杨立文:《论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功用与地位》,载《北大史学》,1993年第1辑。
- [7]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3-534页。
- [9][10]曲青山 高永中:《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8、187页。
- [11]陈寅恪 陈美延:《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 [12]秦维宪:《口述历史:史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教授访谈录》,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0期。
- [13]王海晨 杜国庆:《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 [15]王炳林等:《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2页。
- [16]《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 [17]鬼谷子:《鬼谷子》,石向焘译,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05页。
- [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1年第8期。

(责任编辑:韩永涛)